

太虚思想研究



郭朋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太虚思想研究

郭朋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资源知识
PDG

(京)新登字 03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太虚思想研究/郭朋著. -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97. 8
ISBN 7-5004-2099-4

I. 太… II. 郭… III. 太虚-思想评论 IV. B949. 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2980 号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: 100720)

北京怀柔中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8.75 插页: 2

字数: 450 千字 印数: 1—3000 册

定价: 30.00 元



序一

太虚大师，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的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和重要地位的人物。他创办佛学院，开展僧教育，提倡僧制改革和教制改革，并且极力倡导建议“人生佛教”。在国内，他足迹遍及南北；在国际，他历游日本、南亚和欧美。从而使他成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一位佛学大师。

虚老的思想，内而诸宗融合，外而兼容并蓄，不限一家、不拘一格。他的视野相当广阔，他的治学领域也相当宏博。他学兼内外，博古通今。他胸怀坦荡，与人无忤。而尤为可贵的是，虚老还是一位能够紧跟时代的足迹前进的人。

早在40年代初，作者曾有幸亲从虚老受学。由于走进了一个新的环境，从而使自己开始摆脱思想上的蒙昧状态，并开始接受和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思想，新事物；从此，使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，耳目为之一新，眼界为之大开！而在个人的思想上，也开始向一个新的方向发展着、前进着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来，虚老可说是一位悲剧性人物。除了在创办佛教教育方面，他可说是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之外，在其他的方面，诸如僧制改革、教制改革等等，他的宿愿，可说都未能实现。他也曾想借重某些外部力量来振兴佛教，结果也都落了空；而且，还因此遭受了教内外的一些人士的误解和非议。虚老去世时，还不到60岁，他可说是“赍志以歿”的。当然，虚老在许多方面之所以不能“如愿以偿”，乃是时代使然，而并非由于任何个人的因素。虚老在其《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》一文中，不无伤感地写道：他“……在辛亥革命的侠情朝气中，提出了教理（那时叫学理）革命、僧制（那时叫组织）革命、寺产（那时叫财产）革命的口号，……我的佛教革命名声，从此被传开，受着人们的或尊敬，或惊惧，或厌恶，或怜

惜。……我现今虽仍尽力于所志所学，然早衰的身心，只可随缘消旧业，再不能有何新贡献！”（《太虚大师全书》第五十七册，第[一]六一～[三]六三页）于此可以想见，虚老当时的心情该是多么的沉重！一方面，虚老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；而同时，他又给自己提出了许多实际上难以实现的任务，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。这就注定了虚老必然要成为一位悲剧性人物！

本书意在对虚老的思想（不限于佛教思想），进行一些系统的研究，并尽可能比较全面地把虚老的思想介绍给读者；只是由于水平所限，研究不深，介绍的很可能还不够全面（甚而很可能会有错误）。不过，在系统地开始对虚老思想的研究方面，作者期望，本书能够起到一些“抛砖引玉”的作用。不妥、甚至错误之处，尚望海内外的方家们批评、指教！

虚老虽然不幸早逝，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多达七百余万字的思想文化资料；对于虚老留下来的这些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料，进行系统的研究，这是攻治中国近现代佛教思想史的学者们的一项重要任务，在这方面，作者愿与海内外同仁共勉之！

作 者

1992年5月10日于北京

序二

这部《太虚思想研究》，在体例上，同已经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《印顺佛学思想研究》一书是一样的，也是一部“述而不作”的著作，其原因，也和《印》书一样，这就是：为了让读者能够全面地系统地了解太虚大师的学术思想，我在写作过程中，决定尽可能按照原貌，把虚老极其博大的学术思想，如实地、客观地表述出来，并尽可能用虚老自己的论述，来表达虚老的学术思想，让读者们能从虚老自己的论述中了解虚老学术思想的全貌。

这部书的台湾版（其间，还曾经历过一段小小的波折），是由圆明出版社于1996年5月在台北出版的。对于该社能以大本、精装来出版这部书，我深表感谢；而同时，对于该社在出版这部书时，不仅更改了书名（改《太虚思想研究》为《太虚大师思想研究》——这是情有可原的），而且，对于书中文字，也作了大量完全不应该有的改动（这种情况，是我以往出版的各部著作中从未遇到过的——就连正闻出版社出版《印顺佛学思想研究》一书的台湾版时，也未更改书名，更未改动书中一个字），我又不能不深感遗憾！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，决定按照原稿，重新排版，出版这部书的大陆版。我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！同时，我郑重声明：今后，应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《太虚思想研究》的大陆版为标准本——无论是内容还是文字，均应以这一版本为准！

虚老、印公，不仅都是我的佛学恩师，而且，在人生道路上，还都曾给予过我以重大影响。所以，我先后撰写出《印》、《太》两书，正是为了仰报师恩——如果套用佛经里的话来说，那就是：将此两书奉人世，是则名为报师恩！

明年，是太虚大师逝世五十周年（1947—1997），谨以这部大陆

版《太虚思想研究》的出版，以为纪念；同时，用此书以寄托我对太虚大师的一片哀思，表达我对太虚大师的深切怀念！

作 者

1996年12月15日于北京

第一章 生平与著述

第一节 生平

一、孤苦伶仃的少年时代

太虚大师（1890—1947），俗姓吕，乳名淦森，学名沛林，原籍浙江崇德。父亲吕骏发，先在原籍务农。后来，到海宁县长安镇从一张姓泥瓦匠学手艺，十多年后，入赘张家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12月18日（1890年1月3日），生虚老于浙江海宁县长安镇；一岁左右（一说仅8个月），父亲死；五岁，母改嫁。从此，便依外祖母寄居在一个道士庵里维生。其间，虽曾一度从其二舅父张子纲就读私塾，但因体弱多病，时学时辍。此后的一段时间里，还曾先后跟随他的外祖母朝礼安徽九华山、浙江普陀山以及宁波的天童、育王、灵峰诸名刹。13岁时，被送到长安镇的一家百货店里当学徒，一年左右，因病退学，仍依外祖母寄居在另一小庵里。不久（15岁时），又到长安镇的另一家百货店里当学徒，由于体弱，劳累不堪。可以想见，少年时代的虚老，完全是孤苦伶仃的。

二、出家

虚老16岁时，藉故离开了长安镇（离开了十多年来一直相依为命的外祖母），原想去普陀山出家，旋因因缘时会，乃去到苏州木渎小九华寺，从僧人士达剃度出家，法名唯心。虚老曾自述其初出家的动机时说：“我初出家，虽然有很多复杂的因缘，而最主要的，还是仙、佛不分，想得神通而出家。”（《我的宗教经验》——《太虚大师全书》，以下，只称《全书》，平装本下同，第四十一册，第[一]三四六页）原来，虚老最初出家的动机，乃

是为了成神仙。当然，这种想法，随着虚老对于佛学的理解日深，很快也就改变了。出家当年的九、十月间（出家是在当年的五月间），士达携虚老去镇海拜见师祖奘年老和尚，奘年又为他取法号叫太虚；十一月间，奘年携虚老往宁波，从名僧寄禅（敬安）受大戒，从此，虚老便成为佛教的一位正式僧人。十二月间，寄禅介绍虚老去宁波永丰寺从歧昌法师学经；一两年中，先后从歧昌受学《法华》、《楞严》等经，并阅览《指月录》、《高僧传》等书。歧昌能诗文，虚老亦从之学习诗文。这期间，因有奘年和尚在生活上不断地给以照顾，虚老那病弱的身体，也逐渐得到了康复。

三、游 学

此后，虚老即游学于江、浙、粤各地，或听讲、或阅藏，对于佛教教理的了解日深。其间，除从寄禅等人受学外，还从谛闲（于宁波七塔寺）听讲天台教义。1909年（宣统元年），虚老去南京就学于杨文会先生创办的祇垣精舍（凡半年），同学的，有梅光羲、欧阳渐、邱晞明以及僧人仁山、智光、开悟等人。

这个期间，虚老还先后筹组过佛学精舍、佛教协进会、佛教弘誓会等组织；还曾参加过1913年（民国二年）三月间成立于上海的中华佛教总会的工作（虚老被委任为《佛教月报》总编辑——该刊于1913年5月13日，阴历四月初八佛诞日正式创刊，同年九月，即因经费困难而停刊，仅仅出了四期）。

青年时代的虚老，思想相当活跃（也可说是相当激进），除佛典外，他还曾阅读过托尔斯泰、巴枯宁、蒲鲁东、克鲁泡特金以至马克思等人的著作，以及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、严复（译）的《天演论》，谭嗣同的《仁学》、邹容的《革命军》、章太炎主编的《民报》、梁启超主编的《新民丛报》等书刊（因而虚老一度还曾有过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等思想）。在粤期间，他还同一些革命党人相结交。1911年（宣统三年）3月，广州起义失败后，他因《吊黄花岗》的诗作——“南粤城里起战争，隆隆炮声惊天地！为复民权死亦生，大书特书一烈字”（详见印顺法师撰《太虚大师年谱》——以下简称《年谱》，第四五页），而险遭不测！

四、参加政党

由于思想活跃(激进)，青年时代的虚老，曾先后与鲁少皞、邹海滨、朱执信、叶兢生、章太炎、江亢虎等人有过交往。其间，还曾同朱执信、邹海滨、叶兢生诸人，进行过政治活动。同刘师复的无政府党人，也有接近，同沙淦等人的新社会党(即红旗社会党)人，也过从甚密。1912年(民国元年)1月1日，孙中山先生于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，虚老因社会党人戚某的介绍，晋谒孙大总统，中山先生命秘书马君武代为接见。当时，上海曾有“社会主义研究会”的组织，虚老亦曾参加，并且主张实行“社会主义”(因而他主张寺产为佛教所公有)。他说：“我的政治社会思想，乃由君宪而国民革命、而社会主义、而无政府主义。并得读章太炎《建立宗教论》、《五无论》、《俱分进化论》等，意将无政府主义与佛教为邻近，而可由民主社会主义以渐进阶”。(《自传》——《全书》第五十八册，第〔三二〕一九四页)

由于非常地热心于政治，所以虚老在民国初年(1913年前后)，就加入了“中华民国统一国民党”(党章，曾由樊年交给亦幻，又由亦幻交给《年谱》作者印公)。《年谱》(第六八页)载有该党党章的照片，呈五角形，党章上刻有“中华民国统一国民党”字样，和五色国旗及九星旗，并印有“白平”的名字。对此，根据《年谱》的记载，1948年，僧人乐观，曾就这件事询问过陈立夫先生，陈的答复是：“关于太虚大师遗物统一国民党来由事，前经转询开国文献馆，兹接来复，拟意见两项：一、民元，国民党、共和党两大党成立；同盟会方面，联合统一共和党、国民共进会、共和实进会、国民公党，组成国民党；共和党方面，联合统一党、民社、国民协会、国民促进会等，组成共和党。至若统一国民党，当时并无实现名号，但当时有一传闻。可寻脉络。统一党，原为章太炎、宗 逸初等所组织；统一党并成共和党，在滬统一党员一小部分，因意见脱出，又不满改组，于是有联合而组统一国民党之意，后经调停，并未成立实现。二、五色国旗，由临时参议院提出颁行；长江习用九星旗。五色、九星，并不列党，

或系此义。与武昌方面，毫无所关。至若‘白平’二字，不知何解？或系定章则的暗记。以上所说，仍系或然之辞，究竟来历，惟有存疑矣！”（详见《年谱》第六九——七〇页）据此，则虚老当年所加入的“统一国民党”，并不就是后来的国民党。至于党章上的“白平”二字，据《年谱》考证，就是虚老的化名。《年谱》称：“据樊老及芝峰（民国六年冬，与大师同住，——按：樊老，即樊年，为虚老师祖；芝峰，即石鸣珂，为虚老学生）所说，白平，为大师化名。今考《佛教月报》四期，有《佛法与社会主义》短文，署‘白萍’，思想与大师同。……该党史实虽未详，白平应即白萍之省，为大师化名”。（《年谱》第七〇页）同时《年谱》还说：“虽大师《自传》未论及‘统一国民党’事，但必有深切之关系。”（同上）僧人而参加政党，无怪乎人们多说虚老是一位“政治和尚”！

五、闭关

虚老一度热心于时事政治，后来，几经蹉跎、挫折，到了1914年的7月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虚老目睹时艰，乃颇为感慨地说：“欧战爆发，对于西洋的学说，及自己以佛法救世的力量发生怀疑，觉到如此的荒弃光阴下去，甚不值得！”（《我的宗教经验》——《全书》第四十一册，第[三]三四八——[四]三四九页）经过这样的一番反躬自省，遂于1914年8月间，去到浙江普陀山，10月（按：尘空法师《民国佛教年纪》，说虚老闭关，始于九月；虚老自己则说普陀闭关，“从民国四年”（1915年——详见《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》——《全书》第二册，第[三]五——一页）。此据《年谱》），便闭关于普陀山的锡麟禅院，印光大师为之“封关”，并题其关房为“遯无闷庐”；虚老自署为“味龕”。从此，谢绝俗缘，一心“闭关”。所谓“闭关”，乃佛教的一种自我禁闭的修持方法。具体的做法是：在此期间（一般以三年为期），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（这个房间，称为“关房”，门须紧闭，窗可开启（以便从窗口送饮食等等），不与外人接触（严格的，还不能说话，只能笔谈）。这，实际上也是一种苦修的方法。

三年闭关期间，或坐禅、或礼佛、或阅读、或写作（一般的“闭

关”者，写作的不多），日有常课，从不间断。虚老在闭关期间，除研习台、贤、禅、净、三论各宗著述以及《楞严》、《起信》等经论外，尤专心于《楞伽》、《深密》、《瑜伽》、《摄论》、《唯识》等唯识系经论，尽心钻研，将及两年。此外，对于严复的译作、章太炎等人的文章，虚老也都细心研读。并有著述若干种。1916年（民国五年）8月下旬，孙中山先生视察舟山群岛，偕同胡汉民等人来到普陀，为虚老手题《味 盒诗录》，并署名于左。虚老当即奉诗二首以呈中山先生：“中山先生游普陀，作此，即呈道正：‘卓犖风云万里身，廿年关系国精神，舒来日月光同化，洗出湖山看又新（民国元年，曾约王文典陪先生赴杭，未果，今闻先生新游西子湖来也）。佛法指归平等性，市民终见自由人，林钟送到欢声壮，一惹豪吟起比邻。’五年，孟秋之杪，味 盒太虚未是草。”（见《年谱》第八七页）

1917年（民国六年），2月4日，虚老“出关”。不久，乃作第一次（经由台湾）的短期旅日之行（此为虚老首次出国）。

六、成立“觉社”，创刊《觉社丛书》和《海潮音》

1918年8月间，经与章太炎、蒋作宾、陈元白、张季直等人商定，在上海创立“觉社”，发表《觉社宣言》。这是虚老参加组建佛教社团之始。觉社的初期任务，暂定为：出版图书，编发丛刊，宣传佛学思想。同年十一月，觉社创刊《觉社丛书》（季刊），由虚老任主编，并发表《觉社丛书出版宣言》（和《觉社意趣之概要》），称：“人间何世？非亚、美、欧洲诸强国，皆已卷入战祸，各出其全力以苦相抵抗之世乎？民国何日？非南北争斗，……惟一派团体为旗帜，惟个人权利为标准之日乎？铁弹纷射，火焰横飞，赤血成海，白骨参天，加之以水旱之灾，疫疠之侵，所余锋镝疾苦之残生，农泣于野，商困于廛，士无立达之图，工隳精勤之业。……当此事变繁剧，思潮复杂之世，……惟宏佛法，能顺佛心。……乘是机缘，建斯觉社，固将宏纲异道，普悟群情，非徒以厌世间独求解脱也。……”（《全书》第六十一册，第[-]一〇三六—[三]一〇三八页）则“觉社”的成立，

《丛书》的出版，均乃目睹时艰的产物。

这个期间，虚老又同康有为、胡适之、黎锦晖等人有所交往。（据说，胡适之先生的研究《坛经》与禅宗，就是由于受了虚老的某种启示。）

1919年12月间，《觉社丛书》已出版五期。这时，虚老又同有关人士商议，决定结束上海的觉社，并改《觉书》季刊为《海潮音》月刊。1920年2月，《海潮音》正式于杭州创刊（《民国佛教年记》，说《海潮音》“第一期出版”，是在一月，此据《年谱》），并发表《海潮音月刊出现世间的宣言》，称：“海潮音非他，就是人海思潮中的觉音。”它的“宗旨”是：“发扬大乘佛法真义，应导现代人心正思。”（《全书》第六十一册，第[一]一〇四〇—[二]一〇四一页）仍是想以佛教思想，去影响社会，影响世人。《海潮音》，自1920年2月正式创刊以来，至今已经70多年，现仍在台湾出版发行，为我国历史悠久的一种佛学刊物，它在我国佛教界，具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。

七、试图整理僧制

虚老目睹当时佛教寺院的衰落，便打算对于当时的寺僧制度进行一番改革。1915年（民国四年）冬，他写出了《整理僧伽制度论》（载《全书》第三十三册），正式提出了他的有关改革寺僧制度的设想。当时，佛教寺院的一般情况是：较小寺院，基于剃度制度而形成的师徒关系；大的丛林，基于传法制度而形成的法派关系。这两者，实际上都是一种宗教化了的宗法制度。虚老主张改变这两种制度，寺院财产，应为佛教所公有（这样，便可利用佛教寺院的现有财力，举办佛教的各种文化、教育事业）。在《整理僧伽制度论》里，虚老还提出了其它有关佛教改革的意见。可是，虚老的这种主张，遭到了佛教内部的反对。后来，虚老本人也深深地感到，他的这种改革僧制的主张，实在难以实行，所以，到了1920年的5、6月间，虚老便无可奈何地宣布停止关于改革“僧制”的宣传，而又发表了《人工与佛学之新僧化》提出：“务人工以安色身，则贵简朴；修佛学以严法身，则贵真至，……”（《全书》第三十五册，第[二]一六四页）提倡效法唐代百丈怀海

禅师的那种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的寓禅于农的“农禅”遗风。

八、南北讲经

1920年以来，虚老不断地应邀到南北各地进行讲经活动（在此之前，主要是在江、浙一带讲经）。计先后曾赴湘、鄂、皖、赣、粤、陕、沪以及北京等地宣讲各种佛教经论。1921年9月间，虚老应邀，第二次到北京（1919年7、8月间，为了筹组中国佛教会等事宜，虚老首次赴京，住法源寺，也曾有过讲经活动，蔡元培、胡适之、梁漱溟等人，均曾访晤虚老于法源寺），于广济寺开讲《法华经》，历时两月，听众中，有蒋维乔、胡瑞霖、林宰平、朱芾煌、王虚亭、李隐尘、陈元白（李、陈二人，特从武汉赶来听讲）等人。法会中，平政院长夏寿康等数百人，从虚老受三皈依，做佛教徒。于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法会之盛（此后，虚老又曾多次应邀赴北京讲经——特别是1925年3月和1926年8月的两次在中央（中山）公园社稷坛的讲经法会，尤为隆重，听众数千人，不少名流以及日、英、德等外国友人，也来听讲）。会毕南返，总统徐世昌，特颁赠“南屏正觉”的匾额，并派专人送往杭州净慈寺（虚老时任净慈寺住持）。

虚老因不断地四出讲经，而信众日广，声望日隆。

九、创办佛学院

虚老因鉴于改革僧制的愿望难以实现，乃决意创办佛学院以培养僧界人材。从1922年起，他先后创办（或协助创办）了武昌佛学院（1922年，此为近现代佛教史上有正式的综合性的佛学院之始。创办之初，曾由梁启超先生担任学院第一届董事会的第一任董事长——由陈元白代理）、闽南佛学院（1925年，在厦门，由常惺法师始建，继由虚老任院长）、柏林佛学院（1930年，在北京）和汉藏教理院（1932年，在重庆。1945年，又在西安创建了巴利三藏院）。其中，尤以武院和汉院的影响为大，因为，这两个佛学院，都是由虚老亲手创办，亲自主持，而且时间也都比较长，培养出版的人材也比较多。近几十年来，佛教僧侣中的不少较有学问者，大多出自这些佛学院；而这些学僧，也大都成了宣扬佛学的骨干力量。继上述这些佛学院

之后，各地不少较大寺院，也都纷纷办起了各种不同规模的佛学院，一时间形成了一种举办佛学院的新风尚。于此可以想见，当时虚老在创办佛教僧教育方面，确是开了风气之先；它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所产生的影响，是巨大而深远的。

十、世界佛教运动

虚老不仅在国内办学院，讲佛学，足迹遍南北，四出宣扬，而且还想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佛教运动。这主要表现在他倡议成立“世界佛教联合会”（以及“东亚佛教大会”）和“世界佛学苑”。

1924年7月13日，在庐山召开“世界佛教联合会”。出席会议的，除中国代表虚老、常惺、李政纲等十余人、日本代表法相宗长佐伯定胤和帝大教授木村泰贤之外，还有英、法、德、芬等国的代表多人。会期三天。会上议定：明年，在日本召开“东亚佛教大会”。这是虚老正式开展世界佛教运动之始。

1928年，虚老旅欧（下译）时，在法国，于同年10月20日，假巴黎东方博物馆召开会议，商谈发起创办“世界佛学苑”，办苑“宗旨”为：“昌明佛学，陶铸文化，增进人生之福慧，达成世界之安乐”。（《年谱》第二六七页）“发起人”中，除虚老代表中国外，法国方面的有：伯希和、葛拉乃、阿甘、马古烈、龙舒贝勒等二十多人。商定：通讯处，法国，设在东方博物馆；中国，设在南京毗庐寺（后来，又分别在英国伦敦、美国芝加哥和德国法兰克福等处，增设了通讯处）。虚老当即支付五千法郎，作为筹备经费。后来，“世苑”实际上虽未正式成立，但“世苑”这个名义，却沿用了下来，例如：柏林教理院、汉藏教理院以及巴利三藏院，它们的上面，均冠以“世界佛学苑”（即“世界佛学苑柏林教理院”……）；而武昌佛学院，后来也改成为“世界佛学苑图书馆”。

十一、日本之行

1925年10月27日，虚老率领由道阶、持松、弘伞、王一亭、胡

瑞霖、韩德清、徐玉森、甯达蕴等 26 人组成的“中华佛教代表团”（虚老任团长，道阶和王、胡三人分任副团长），从上海动身前往日本，参加“东亚佛教大会”，并进行访问。29 日，抵达日本神户；30 日，抵东京，受到日本佛教联合会主事窪川以及佐伯定胤、木村泰贤等近万人的欢迎。

11 月 1 日上午，东亚佛教大会于增上寺大殿举行开幕式，会期三天，于 11 月 3 日下午闭幕。会上，虚老宣读了题为《阿陀那识论》的论文。

11 月 4 日开始，中华佛教代表团，由水野晓梅等陪同，赴日本各地参观访问。除神户、东京外，代表团还先后访问了名古屋、京都、奈良、大阪等地，受到日本朝野，特别是日本佛教界的热烈欢迎。虚老特别应邀到日本各寺院和各大学访问、讲学；日本佛教界名流诸如大西良庆、木村泰贤、南条文雄、井上圆了、村上专精、大内青峦、高楠顺次郎、铃木大拙、常盘大定等人，都纷纷前来访晤、交谈。

虚老访日 20 多天，于 11 月 21 日，率代表团离开日本回国。虚老这次的日本之行，同日本界（特别是佛教界）进行了广泛的接触，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。

十二、欧美之行

从 1925 年起，虚老便有了游化欧美的打算，经过几年的酝酿、准备，终于在 1928 年得以实现。

1928 年 8 月 11 日，虚老偕翻译郑太朴、赵寿人，乘外轮从上海出发，开始了他的欧美之行。临行之前，王一亭、张君勱、黄警顽、吴贻芳等人，为虚老饯行，与会者，男女六、七十人。蔡元培、张君勱、胡适之、王正廷等人，并为虚老写介绍信给他们的欧美朋友，以便虚老届时能同这些外国友人进行会晤。虚老途经香港、西贡、星洲、科伦坡（上岸，参观佛寺及佛教大学）、苏彝士运河（上岸，参观开罗和金字塔）而进入地中海，航行月余，于九月十四日，抵达法国马塞，次日

晨，到达巴黎，从此，正式开始了这次对法、英、比、德、美的访问活动。

在法国，访问文化团体，会晤各界名流，并有“世界佛学苑”的发起；且与伯希和等人“互致倾慕”（《年谱》第二八一页）之忧。

在英国（10月23日，抵达伦敦），因蔡元培的介绍，虚老得与大哲学家罗素亲切会晤，畅谈佛学与哲学问题。当时旅英的章士钊先生，也亲至寓所访晤虚老。（牛津、剑桥大学，都曾表示邀请虚老前往讲学，因日程太紧，均未能如约。）访英之后，又访问了比利时。

在德国（11月16日，抵德），除了广泛会晤名流、学者、并进行访问、讲学活动之外，还同留德学生俞大维、周自新、李祖冰、邓名方等人时相晤谈；并与邓演达、黄祺翔、任右民等人相会晤。

在美国（1929年2月22日，抵达纽约），访问了纽约，华盛顿、芝加哥、旧金山等城市。由江亢虎、王文山陪同，参观了胡佛总统的就职典礼；并由江亢虎夫人陪同，参观了国会图书馆。还应邀到一些大学（如哈佛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等）去作学术讲演。除会晤某些美国名流、学者外，还同旅美学者晏阳初、陈焕章等人进行了晤谈。

1929年4月3日，虚老离美回国。途经檀香山、神户等地，于4月29日晨，回到上海。虚老这次的欧美之行，历时七个多月，访问了两个大陆的五个国家，佛学西播，影响甚大！（这次的欧美之行结束后，虚老撰写了《寰游记》——载《全书》第五十八册，详细地记述了他这次欧美之行的全部经过，有兴趣者，可以参阅。）

十三、率团访问緬、印、錫蘭（斯里兰卡）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当时的国民政府当局，为了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，便想通过佛教这一渠道，同南亚各国增进交往，于是有组织佛教访问团的酝酿。1939年的8、9月间，这件事，已经酝酿成熟，大体上定了下来：由政府聘请虚老担任访问团团长，拨给经费；访问团，则以佛教界自动组织的名义而成立。这样，就正式组成了以虚老为团长（兼任导师）的出访缅甸、印度、锡兰（斯里兰卡）等国家